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一个研究述评

杨 君¹,褚桂楠¹,肖明月²

(1.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与保险系,杭州 310018)

摘 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问题,因此经济增长如何从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变,已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增长质量也成了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理清研究脉络的同时,归纳分析了以往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内容,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未来研究方向以及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方法;全要素生产率;主成分分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6) 06-0515-07 **引用页码:** 120101

经济增长的早期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等方面,即重点关注数量增长方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数量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背后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环境恶化等,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外在的经济增长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必须用内在的综合增长质量来予以反映,因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便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测量方法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述,并指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

已有研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学者多从狭义和广义的两个方面给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

(一)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多从某一个方面去阐述,如效率的变化、增长方式的变化、竞争力的提高等^[1]。卡马耶夫^[2]较早地从效率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刘亚建^[3]和康梅^[4]的研究也有相似的见解。王积业^[5]基于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角度的研究、沈利生等^[6]基于增加值率角度的研究和章祥荪等^[7]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的研究,视角都与效率提升的研究较为相似。经济增长质量包括了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只从效率方面进行研究存在较大局限性^[8]。郭克莎^[9]则进一步指出,除经济增长效率外,经济增长质量还包括了国际竞争力、通货膨胀率和环境污染程度。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还存在着资源配置、经济效益反映上的困难,低估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0]。除了增长效率,沈利生等^[11]还曾使用中国出口的增加值率反应经济增长质量,该方法仅适

收稿日期: 2016-06-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126);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5C35001);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基地项目(2015KYLX07)

作者简介: 杨 君(1984-),男,安徽宿州人,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研究。

用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间的比较,或是一个国家不同同时段的比较,衡量的是相对质量,并不适合对绝对质量的衡量,局限性较大,因此使用的学者并不多。

(二)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由于狭义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学者便从广义的角度去衡量经济的增长质量,即把社会和政治等与经济关系密切的因素都包括进来(托马斯^[12]、Barro^[13])。王薇等^[14]则在经济增长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经济的结构协调与平稳运行,进而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界定,随洪光等^[15]的研究也与之类似,除了增长效率,他们还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角度定义了经济增长质量。还有部分学者从优劣程度方面进行了分析,如彭德芬^[16]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政治等各个指标的优劣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这也与Kuznets^[17]、刘燕妮等^[18]、Eggers等^[19]关于结构指标的研究有着相似性。Vinod^[20]、钞小静等^[21]则从福利效应的视角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注重对个人发展、国际空间、生态环境的考量,本质上看,这也是使用指标的优劣进行界定。也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进行了研究,如张继海等^[22]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界定,魏婕等^[23]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两个层次进行了界定,钞小静等^[24]则从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层次进行了界定。

以上学者的界定相互交叉,但又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很多学者开始使用包含多种指标的方法去阐释经济增长质量(单薇^[25]、刘树成^[26]、钞小静等^[21]、毛其淋^[27]、程虹等^[28]),即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金融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类指标综合起来考虑。不管是使用某些指标,还是使用较为广泛的指标,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使用的都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优劣,而这些皆属于结果评价,叶初升^[29]则认为合适的发展目标更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叶初升等^[30]则提出用发展理念去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些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

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界定的同时,如何测度经济增长质量也成了学者大量研究的内容之一,且学者不断改进前人的研究方法,以使之更加全面完善。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用于测度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而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有: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

(一)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算方法主要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需要指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如杨飞虎^[31]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李京文等^[32]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非参数法主要是指指数方法,如使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郑京海等^[33]、章祥荪等^[7])。魏下海等^[34]则分别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计算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学者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是Islam等^[35]的研究再排除这一问题后,计算的结果也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较为一致。康梅^[4]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更多地是体现了技术进步,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可能并不精确,郑玉歆^[10]的研究也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只能反映当期情况,不能全面反映长期情况和资源配置状况,所以仅靠全要素生产率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完全的。Young^[36]对东亚部分国家的研究发现,当新加坡因修建基础导致投资迅猛增长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下降。Kim等^[37]研究也证明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变化,因此不适合用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

(二)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以综合评价指标排序的一种方法,部分学者利用该方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单薇^[25]就曾利用该方法测度了中国1995—200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项泽宇等^[38]也基于该方法对宁波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核算。由于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不能很好地反映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部分学者将其他方法与熵值法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评价,如郁利花^[39]在熵值法的基础上引入德菲尔法,然后结合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最后得到组合权值;刘小瑜等^[40]用集对分析法度量各评级对象与评价标准的差距,用熵值法计算权值,并对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三)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利用降维处理的思想,即在一组观察指标中选取少数因子去刻画变量的关系,因子分析得到的权重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因此不少学者都使用过该方法。如刘海英等^[41]就使用该方法对中国转型之后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实证测度。因子分析法还可以结合其他方法共同

进行研究,李卫国^[42]就曾因子分析和层次聚类分析对省际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进行过研究,刘燕妮等^[18]则通过因子分析法来确定权重,然后通过主观打分确定不同经济结构的失衡程度,进而测度出经济增长质量。叶初升等^[30]则使用了结合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方法在内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方法不仅能够较好地评价经济增长质量,还能够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由于经济经济增长质量不只是衡量单个维度指标,而是多个维度的,但因子分析法却很难较好地对之进行测度,只能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刘海英等^[41]),故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在很少信息损失的情况下,用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代替原来多个变量指标,测度的权重具有客观性,对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准确性有一定的改善。钞小静等^[21]、毛其淋^[27]、随洪光等^[15]都采用该方法测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但他们构建的测度指标存在一定差异。文建东等^[43]利用该方法,使用县级数据测度了中国三大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肖明月等^[44]则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主成分分析法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影响,会造成部分指标差异信息的丢失问题,因此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而熵权法则可以是进行客观的赋权,因此可以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进而得到较为准确的评价方法,王薇等^[14]就使用过该方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门可佩等^[45]则使用聚类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并采用江苏省数据进行了实证测度。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且影响因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现有文献多是在实证分析中分析具体因素对其所测得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而没有分析其具体因素作用机理,根据不同学者关于不同因素的观点进行梳理,并对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产品质量和金融发展等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进行阐述,且结合具体的文献研究进行分析。

(一)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有着较强的内在联系,经济结构失衡将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共同下降。项俊波^[46]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五大结构的基本失衡,某一项结构的失衡都会导致其他结构的联动变化,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

质量下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的状况,即生产率增长低的企业将出现资源流失情况。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企业将获得这部分资源,进而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刘燕妮等^[18]、李娟伟等^[47])。吕铁等^[48]、刘伟等^[49]指出,当资源在产业之间进行再配置时就会产生资源再配置效应,即产业结构调整会降低中间消耗,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比。但政府在扶植新兴产业时,通常是通过扭曲市场价格来实现资本和技术的再配置,使得要素与部门出现错配,进而导致了“过剩”与“短缺”共存的问题,降低了要素的配置效率(李娟伟等^[50]);二是从金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进行的研究,郭路^[51]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可能会对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如将其转化为正向需求效应,则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增长质量;三是从区域经济结构的视角进行研究,李娟伟等^[47]认为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则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中国各地区重复性建加剧了供给结构失衡的程度,造成了这些产能过剩,阻碍结构升级,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技术进步

Solow^[52]较早地对技术进步进行过研究,他发现美国经济增长有87.5%归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使收益递增,从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等^[53]、魏婕等^[54]);任保平等^[55]则认为技术进步还可以克服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李卫国^[42]进一步指出,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利用维度与空间方面,技术进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能够大大提升劳动对象的自主性和生产效率;毛其淋^[27]还显示技术进步能够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结构,增强持续增长能力。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使得经济增长受到限制,当引入技术进步时,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可得到更多的产出,使收益递增,提高生产率(任保平等^[55])。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傅元海等^[56]、于津平等^[57])、产品质量提升(李卫国^[42])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质量。

(三)福利分配

增加居民的福利水平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之一,如果无法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则属于低质量的增长。同时,毛其淋^[27]认为如只有部分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种增长也是低质量的。福利分配状况会影响社会需求水平、需求结构、人力资本积累,

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钞小静等^[24]、李娟伟等^[47])等,进而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当福利分配不平等时会引发以下问题:一是低收入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其购买能力有限,因此导致了社会需求的下降;二是引发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当福利水平过低时会带来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任保平等^[55]);三是导致教育和医疗服务享受机会的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实现高效率的增长(钞小静等^[24]、毛其淋^[27])。

(四)资源环境

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下,为避免落入“增长极限”,就必须关注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为:以最少的成本来治理污染,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使增长成本最小化;以最优的组合来利用资源,进行资源重复利用,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即通过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任保平^[58]、李娟伟等^[47])。而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过度开发和利用,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平衡,还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使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刘海英等^[41]、毛其淋^[27])。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环境退化成本也在快速增长(李娟伟等^[47]),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生态质量的提升(钞小静等^[59]),而生态质量也是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衡量的指标之一。何强^[8]则进一步将要素禀赋与资源环境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所面临的重要约束之一就是能源消耗。

(五)产品质量

程虹等^[28]认为高质量产品的出现会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意愿,还可提高产出收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促进各阶层收入分配公平,进而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罗连发^[60]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德国和瑞士两个山区国家的经济发展高于我国山区的主要因素是微观的产品质量。罗英^[61]认为质量可以调整影响经济结构的各种因素,从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产品质量机制可以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创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形成质量竞争的内在激励,避免各种要素资源的浪费,提高总体投入产出效率水平。

(六)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资源误配情况,如利率管制、政府干

预和配给等会导致金融机构寻租行为的大量出现(周业安^[62]、周方召等^[63]),刘文革等^[64]的研究也认为金融资源误配会导致部分行业或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带来负面影响。陈刚等^[65]的研究显示,1999—2006年中国金融发展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姚耀军^[66]虽然支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正相关关系,但也指出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因此只有消除金融发展的扭曲,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七)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学者还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汪春等^[67]认为 FDI 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所以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随洪光^[68]则发现 FDI 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则有利于经济的高效率和稳定发展,因此 FDI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可能是较为复杂的,有利于某一方面的同时,会对其他方面造成不利影响(Fry^[69])。Tahvonon 等^[70]则从再生资源产业替代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高艳红等^[71]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倒 U 型”影响曲线。杨孟禹等^[72]从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还有学者分析了教育^[30]、企业投资^[73]、要素禀赋^[8]、发展阶段^[14]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四、结 论

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提出以来,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改善,学术界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为该领域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也为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研究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a)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及外延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学者多是根据自己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而导致相关研究或不够全面或过于宽泛,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准确测度和影响因素的确定。

b)在指标构建方面,缺乏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往研究多是泛泛地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构成要素,缺乏一个分析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理论框架,进而使得学者在选定基础指标和方面指标时具有较大随机性,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具有可比性。

c)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的不统一。虽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但应用型较强的方法较少,很

多方法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可以进行实证测度的方法也多存在一定的缺陷,现阶段仍缺乏一个全面、统一的测度方法。

d)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机理分析。以往研究多是从外生因素展开实证研究,鲜有从内生因素和理论机制方面的研究,因此无法准确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机理,也无法提出可信度和可操作性较高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 [1] 沈坤荣. 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998(1): 28-33.
- [2] 卡马耶夫.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 陈华山, 译.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19-32.
- [3] 刘建亚. 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 [J]. 思想战线, 2002(4): 30-33.
- [4] 康梅. 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与经济增长质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2): 153-160.
- [5] 王积业. 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 宏观经济研究, 2000(1): 11-17.
- [6] 沈利生, 王恒. 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 经济研究, 2006(3): 59-66.
- [7] 章祥荪, 贵斌威.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Malmquist 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6): 111-122.
- [8] 何强. 要素禀赋、内在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 统计研究, 2014(1): 70-77.
- [9] 郭克莎. 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J]. 经济研究, 1996(1): 36-42.
- [10] 郑玉歆. 全要素生产率再认识: 用 TFP 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若干局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9): 3-11.
- [11] 沈利生, 王恒. 增加值率下降意味着什么[J]. 经济研究, 2006(3): 59-65.
- [12] 托马斯. 增长的质量[M]. 翻译组, 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29.
- [13]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M]. Chile, Santiago: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 2002.
- [14] 王薇, 任保平. 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阶段性特征: 1978-2014 年[J]. 改革, 2015(8): 48-58.
- [15] 随洪光, 刘廷华. FDI 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11): 3-20.
- [16] 彭德芬.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8-22.
- [17]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3): 247-258.
- [18] 刘燕妮, 安立仁, 金田林. 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2): 20-35.
- [19] EGGERS A, IOANNIDES Y M. The role of output composition in the stabilization of US output growth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 28(3): 585-595.
- [20] VINOD H D. Open economy and financial burden of corrup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Asian[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3(6): 873-890.
- [21] 钞小静, 惠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6): 75-86.
- [22] 张继海, 李发毅. 经济增长质量辨析与评价[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4(11): 50-55.
- [23] 魏婕, 任保平.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 经济学动态, 2012(4): 27-33.
- [24] 钞小静, 任保平. 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 财贸研究, 2014(5): 1-9.
- [25] 单薇. 基于熵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3(10): 49-54.
- [26] 刘树成. 论又好又快发展[J]. 经济研究, 2007(6): 4-13.
- [27] 毛其淋. 二重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J]. 经济科学, 2012(2): 5-20.
- [28] 程虹, 李丹丹. 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 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解释[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79-86.
- [29] 叶初升.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增长质量[J]. 天津社会科学, 2014(2): 96-101.
- [30] 叶初升, 李慧. 以发展看经济增长质量概念、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12): 17-34.
- [31] 杨飞虎.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952—2008[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9): 1-7.
- [32] 李京文, 郑友敬, 杨树庄, 等. 中国经济增长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1): 15-36.
- [33] 郑京海, 胡鞍钢.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 年)[J]. 经济学, 2005, 4(2): 263-296.
- [34] 魏下海, 余玲铮.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与适用性研究: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比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 76-83.
- [35] ISLAM N, DAI E, SAKAMOTO H. Role of TFP in China's growth[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6, 20(2): 127-159.

- [36]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8): 641-680.
- [37] KIM J, LAU L.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8(3): 235-271.
- [38] 项泽宇, 陈晓俊, 钟泽璐, 等. 基于熵值法的宁波市经济增长质量分析[J]. 经营与管理, 2015(4): 91-93.
- [39] 郁利花. 基于组合权重的浙江省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 价格月刊, 2011(1): 60-63.
- [40] 刘小瑜, 汪淑梅. 基于集对分析法的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12): 48-53.
- [41] 刘海英, 张纯洪.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 2006(2): 13-22.
- [42] 李卫国.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D].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34-43.
- [43] 文建东, 李慧.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以县域经济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7): 72-79.
- [44] 肖明月, 杨君. 要素质量、要素配置效率、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浙江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 浙江金融, 2015(1): 70-75.
- [45] 门可佩, 唐沙沙, 赵凯, 等. 江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J].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6): 550-555.
- [46] 项俊波.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9): 1-11.
- [47] 李娟伟, 任保平, 刚翠翠.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4(4): 161-167.
- [48] 吕铁, 周叔莲.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管理世界, 1999(1): 113-125.
- [49] 刘伟, 蔡志洲.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改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J]. 经济研究, 2008(4): 4-14.
- [50] 李娟伟, 任保平. 重庆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与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3): 95-102.
- [51] 郭路. 中国国际收支余额变化与宏观经济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2(2): 41-48.
- [52] SOLOW R K.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 & Statistics, 1957, 39(3): 312-320.
- [53] 钞小静,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 经济研究, 2011(4): 26-40.
- [54] 魏婕, 任保平. 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 1952-2007 年的数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11): 36-44.
- [55] 任保平, 王蓉. 经济增长质量价值判断体系的逻辑探究及其构建[J]. 学术月刊, 2013(3): 88-94.
- [56] 傅元海, 张丹, 孙爱军. FDI 技术溢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研究[J]. 当代财经, 2010(6): 75-84.
- [57] 于津平, 许小雨.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资利用效应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1): 72-81.
- [58] 任保平. 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阐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J]. 学术月刊, 2012(2): 63-70.
- [59] 钞小静, 任保平. 中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6): 50-56.
- [60] 罗连发. 产品质量如何决定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山区的实证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87-92.
- [61] 罗英. 产品质量规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原理与案例的双重诠释[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32-38.
- [62] 周业安. 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2): 13-20.
- [63] 周方召, 刘文革. 宏观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与经济增长: 一个文献述评[J]. 金融研究, 2013(7): 15-21.
- [64] 刘文革, 周文召, 仲深. 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J]. 经济学家, 2014(3): 64-73.
- [65] 陈刚, 李树, 刘樱. 银行信贷、股市融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动态[J]. 经济评论, 2009(6): 47-56.
- [66] 姚耀军.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区域差异重要吗? [J]. 当代财经, 2012(3): 43-53.
- [67] 汪春, 傅元海.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J]. 湖南商学院学报, 2009(5): 21-24.
- [68] 随洪光. 外资引入、贸易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J]. 财贸经济, 2013(9): 85-94.
- [69] FRY M J. H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s the current account in Pacific basin economies[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6, 7(3): 459-486.
- [70] TAHVONEN O, KUULUVAINEN J. Economic growth, pollution, and renewable resourc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993, 24(2): 101-118.
- [71] 高艳红, 陈德敏, 张瑞. 再生资源产业替代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省域经济视角的实证检验[J]. 2015(1): 18-28.
- [72] 杨孟禹, 张可云. 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中国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J]. 财经论丛, 2016(3): 3-10.
- [73] 郝颖, 辛清泉, 刘星.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J]. 经济研究, 2014(3): 101-114.

Research Review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YANG Jun¹, CHU Guinan¹, XIAO Mingyu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vestment and Insurance,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hina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us, how to change economic growth from quantity driven to quality driven is a problem.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has also become one of ho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The paper reviews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n clarifies the research scheme, summarizes inadequacie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tent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perfected at last. The paper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making.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measurement metho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s

(责任编辑:陈和榜)